

# 知识与制度脉络中的东亚概念史研究

——“东亚近代知识与制度的形成”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里峰 陈蕴茜

[关键词] 概念史;东亚;知识与制度

[摘要] 2011年11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东亚近代知识与制度的形成”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概念史的视野与方法、东亚近代基本概念的形成、知识/制度与权力、翻译实践与跨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堪称东亚概念史研究的一次盛会。与会者既描绘了中国和东亚概念史研究的宏伟蓝图,也提醒人们注意到这一新兴领域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想取得像西方同行们那样的巨大成就,中国和东亚的概念史研究者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2011年11月4日至5日,由中国南京大学、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共同主办,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承办的“东亚近代知识与制度的形成”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及台湾、香港地区的20余名学者参加会议并宣读论文。会议共收到论文23篇,分别围绕概念史的视野与方法、东亚近代基本概念的形成、知识/制度与权力、翻译实践与跨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者还就东亚概念史研究的可能性展开了热烈讨论。此次会议规模不大,却汇集了当前国内外从事概念史研究的一批优秀学者,堪称东亚概念史的一次盛会。

## 一 概念史的视野与方法

概念史兴起于20世纪后半期的德国,随着《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辞典》、《法国的政治—社会基本概念手册》等大型辞书的陆续出版,逐渐成为国际学界备受关注的史学类型和跨学科研究领域。但在中国和亚洲学界,概念史的译介和实践不过数年时间,尚处于起步阶段。当此之际,对概念史视野与方法的探讨显得尤为重要,此次会议即有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涉及这一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方维规是较早译介和实践概念史的中国学者,曾多次撰文介绍德国概念史研究之要旨。此次提交会议的《“鞍形期”与概念史——兼论东亚转型期概念研究》,对德国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的“鞍形期”假设作了深入

评析,进而提出了东亚国家开展“比较概念史”研究的可行性。论文指出,科塞雷克所谓“鞍形期”之说,系指欧洲从早期近代走向19和20世纪、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他所倡导的概念史试图从语言视角把握现代世界,以概念变迁给“鞍形期”之说提供依据。德国学派的概念史研究同社会史密切相关,注重社会事实和变迁、时代的实际经验以及历史语境。现代概念不仅是时代的表征,也是推动历史的因素,并具有时代性、政治化、民主化、可意识形态化的特征。19世纪这一萌生“全球性”的时代,也是东亚的巨大转折期。西方影响和东亚“接轨”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概念的传输。鉴于东亚过渡期之“不同时历史的同时性”或“同时历史的不同时性”,亦鉴于概念的含义见之于用法,发展一种东亚国家的“比较概念史”和一些关键概念的“运用史”是极为有益的。

在概念史研究领域,韩国和日本比中国先行一步,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来自翰林大学的两位韩国学者,以学术述评和个案考察为我们展现了韩国概念史研究的风采。梁一模在《近年来韩国概念史研究述评》中指出,自1990年代中期起,为了从模仿的时代过渡到创造的时代,在韩国社会科学领域提出了研究政治社会概念之源的主张,迄今已近二十年。2007年,韩国翰林大学翰林科学院得到韩国研究财团的支持,推出了以“东亚基本概念相互疏通”命名的大型研究项目,成为韩国概念史研究的据点。作为其主要研究成果,探讨历史基本概念的“韩国概念

史丛书”已出版《万国公法》、《国家·主权》、《宪法》、《国民·人民·市民》、《民族·民族主义》、《文明》6册；侧重“底面历史”的《日常概念丛书》即将出版“青年”、“疾病”、“幸福”、“教养”、“儿童”、“恋爱”等册；刊行《概念疏通翻译系列》、《概念疏通研究丛书》、《概念疏通资料丛刊》，分别作为介绍概念史研究成果、探讨概念史理论方法、收集概念史重要资料的阵地；《概念与疏通》杂志已出至第7期，并即将创办英文期刊《东亚概念与文本》。

朴根甲的《在概念与隐喻之间——申采浩(1880~1936)的历史世界》则以20世纪初韩国历史学家申采浩为个案，对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了深刻反思。申采浩将概念和隐喻巧妙地结合起来，把对未来社会的展望与过去经验世界的基础嫁接在一起。其论著中的“国民”既指称危机时代，又指的是引领时代的运动概念，该言辞蕴含的意义平面延伸到了未来，可是倒映在“镜子”中的历史停留在更为流动和原初的隐喻空间里。申采浩的历史观印证了当代概念史家关于隐喻与概念之关系的论述：概念是牢固、明确和鲜明的，能够起到影响规定时代的作用；隐喻则是渗透到直接阐明现实世界的概念对象不在的空间，是让人们通过象征性进行掌控的记号，隐喻给和原初现实世界的偶然性相遇时产生的不安提供通道。概念史和隐喻学密切相关又各异其趣，应该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 二 东亚近代基本概念的形成

过去几年间，一批中国学者以不同的名目（“概念史”、“观念史”、“新名词研究”等）和不同的方法（“知识考古”、“数据库方法”、“历史文化语义学”等），对近代中国若干社会与政治基本概念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如“自由”、“民主”、“科学”、“经济”、“社会”、“东洋/西洋”、“封建”、“文明/文化”、“知识分子”等。此次会议收到的论文，在这一清单上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位与会者不约而同地探讨了近代东亚的“历史”概念和历史观问题。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历史的意义”：略论晚清中国对“历史”的认知和阅读》集中检讨何以在晚清科举改制中“历史”构成考试的主要内容，并就应试士子答卷中对“历史”的阐释进行了分析。论文指出，晚清中国对“历史记忆”的延续，明显区分为不同的维

度，起决定作用的是历史阐述者的“立场”。透过章太炎及其领导的“国粹运动”，可以看到“历史记忆”既是历史记忆复返，也是选择性遗忘的过程——把“国”与当今的朝廷分开。这些复合的因素，某种程度地影响了后来国家建构的基本蓝图，也使得晚清士人不接纳在清朝皇帝之下从事政治变革的论题。科举改制中的“历史”，却仍保留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印痕，立足于“自改革”的立场，着力于从历史中发掘可资借鉴的经验，重要的是在历史中重新发现维护自我荣光的资源。所谓“历史的意义”，在晚清中国也得以充分展现。影响所及，在“历史”中寻求富强之道、维系文明的优越感，透过“历史”以“经世致用”，并在科举考试及新式学校教育中安排相关内容，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铃木贞美《日本的“历史”概念与历史观概述》描述了日本“历史”概念与历史观从前近代、近代直到现时代的大致变迁过程。前近代日本知识阶层的“历史”概念及历史观深受中国“史”的影响，所不同者，日本持有的是连续史观。近代以来，日本引入了西洋的近代历史概念及历史观——如进步发展史观，其中1920年代基于科学崇拜而信奉“历史必然性”的唯物史观也曾吸引众多的信仰者；战时则转换为宇宙生命“生生发展”的历史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冷战体制下，日本近半数知识分子成为反体制者，信奉唯物史观尤其是沿袭日本共产党1932年政纲的“讲座派史观”。在冷战体制终结前后，所谓历史修正主义抬头，历史教科书问题便是一个明证；当今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日本的“宇宙大生命”观念或“民族生命”观念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因此，必须彻底地重新审视二战后编纂的日本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同时也须审视旧有的历史概念及其分析图式。

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系施耐德(Axel Schneider)《时间的观念：进步史观及其批评》以章太炎、梁启超、柳诒徵为例，考察了现代中国的时间/历史观念。作者认为，章太炎对进化论的批评从根本上侵蚀了现代性的根基，并拒斥了作为现代化代理人的国家。梁启超没有超出现代性的范围，他试图对进化论与因果性及其后果加以调和，并努力使自己的“浪漫”倾向与维持作为新世界秩序基本单元的民族的发展相适应。柳

诒徵将历史视为对道德宇宙秩序的反思,他力图整合科学与民主(法治/主权)等现代因素,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将其融入连续性的、非进步的宇宙秩序之中,从而使它们去现代化了。梁启超可以被称作一个“温和的现代化主义者”,章太炎和柳诒徵则在各自的道路上背离了现代主义的框架。然而,他们都未能解决将现代化与实现富强相结合的问题。背离了进步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历史、时间及主观性观念,却又希冀能够抵挡住现代的攻击,这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施志伟(Zach Smith)《从早期〈教育杂志〉看晚清国民概念》以1909年创办的《教育杂志》为例,考察了晚清“国民”概念的内涵及其面对的各种压力。作者梳理了《教育杂志》两位早期撰稿者庄俞(1876~1938)和陆尔奎(1862~1935)关于“国民教育”的辩论。庄俞认为国民教育的目标是提高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培养具有责任感、义务感的现代公民,因此国民教育应从创新和提高小学课程做起;陆尔奎则认为国民教育中所要教导的“国民”是已然存在的大清子民,而不是一个衡量受教育水平而得出的抽象社会群体,因此国民教育应该通过扫盲运动、新式教育大众化的途径来实现。由于改革者对“国民”概念还没有准确的定义,它所包含的意义将随着改革者对它的使用和诠释而产生矛盾和变化。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外国语学部川尻文彦《近代中国的“哲学”概念:以蔡元培为中心》细致梳理了近代中国“哲学”概念的形成过程。作者指出,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哲学”并非不言自明之学,而是通过几个历史的、思想史的过程,逐渐被认识并建构起来的。在此过程中,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胡适等人扮演了重要角色。蔡元培从1890年代末开始对“哲学”进行探求,主要向导是日本出版的哲学解说书。蔡元培先后出版三部哲学教科书,即1903年的《哲学要领》(科培原著)、1915年的《哲学大纲》、1924年的《简易哲学纲要》,皆大受人们欢迎。在留学德国及担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蔡元培始终对“哲学”持拥护的态度。蔡元培对以实用主义方法论解读中国古代哲学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给予了高度评价,是因为在试图从哲学上融合中西文化这一点上,他和胡适产生了共鸣。而在1922年撰写的《五十年来中国

之哲学》中,他将西洋哲学的介绍和国故的整理相并列,却坦承融合两者以确立独特的“中国之哲学”的目标尚未实现。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黄兴涛、陈鹏《“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的最初流播及其历史契机考述》指出,1920年代初是“现代化”(或“近代化”)概念初登中国历史舞台的阶段,它们尚未成为社会各界广为运用的语词;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则是这一概念逐渐流行开来的时期,含义日趋明确,使用范围也扩展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个领域。“现代化”概念的流行,是国际国内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甚至矛盾作用的产物,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事件、国民政府统一政权的建立及其鼓吹的“建国论”、1934年旨在对抗“西化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唯物史观的兴起和盛行等,都为这一概念的流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现代”、“现代式”概念的先行传播,特别是其现代性内涵的逐步约定和辐射领域的日渐丰富,也为“现代化”一词的涌现和流行创造了条件。同样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出现的“现代性”一词,则在民国时期始终没有真正流行起来,其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与“现代化”不可同日而语。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里峰《中国共产革命中的“群众”概念》梳理了近代中国“群众”概念的渊源和演变,并对“群众”话语对于中国共产革命的政治功能作了初步探讨。“群众”概念于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在其意涵的演变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古代典籍里“群众”一词的负面用法与西方近代的群众心理学合流,“群众”遂成为带有“乌合之众”含义的mass、crowd的中文译名;另一方面,“群”、“合群”、“群学”这一组词汇的正面意义(虽然很快被“社会”、“社会学”所取代)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脉络中的“人民”、“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相交汇,使“群众”重新获得了积极意涵,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主体力量。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和群众理论的成熟,中国共产党从193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群众路线”,“群众”概念由此找到了最有力的表达形式,并为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和政治运作提供了有效的概念工具与治理技术。

### 三 知识、制度与权力

20世纪后半期以降,福柯(Michel Foucau-

lt)、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的话语/权力理论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话语”(discourse)和“表象”(representation),致力于从知识和制度中探寻权力的经纬。这一场与概念史密切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被冠以“东亚近代知识与制度的形成”之名,其缘由或许正在于此。数篇参会论文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知识/制度背后的政治意涵,为概念史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外国语学部黄东兰《“吾国无史”乎?——从“支那史”、“东洋史”到“中国史”》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个教科书文本为中心,考察了近代日本支那史、东洋史对清末中国史叙述(尤其是清朝官方历史叙述)之影响。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1888~1890)创造了文明史的中国史叙述范式,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时期。桑原鹭藏的《中等东洋史》(1898)将当时德国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运用于东洋史的书写之中,在帝国对外扩张的背景下,其“东洋史”关心的并非东亚(不包括日本在内)各民族如何各自建立民族国家,而是将它们置于“东洋”这一19世纪日本人再创造的地理和想象空间里。清末史家陈庆年以桑原著之汉译本为底本改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9年)则并未接受其“民族竞争史观”,而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和正统史观,构筑了由“内地”和“外藩”两部分构成的“中国史”。从中可以看到,虽然欧美文明史观下的万国史叙述最早由传教士介绍至中国,但直到甲午战争之后大批晚清知识人东渡日本,才以明治以后出现的支那史和东洋史为媒介进入中国,经过翻译、改译、改编、审定等不同途径,在世纪之交成为广泛流通的公共知识。

日本北海道大学吉开将人《民族起源学说在二十世纪中国:从“外来/原住”模式到“土生=世居”模式》聚焦于20世纪中国的民族起源学说,指出其演变过程既是以民族交替(占领/驱逐)为前提的“外来/原住”模式向“土生=世居”模式的转化,又是一元论和多元论相互交替的过程。它与基督教、种族/民族学、地质学、考古学等新的学术思想与学术制度的传播和发展有关,同时也离不开各时期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环境。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采用汉族在黄帝率领下从西方迁移而来的“外来/原住”模式,因为这一学说可以在亡国危机下唤醒国人的使命感。

20世纪20、30年代,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尤其是城子崖遗址和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国学者逐渐确立了“土生=世居”的中国上古史。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于团结御侮的政治需要,学术界倾向于强调中国史前居民的“一元一体性”而尽量避开多元论,另一些学者则以从中原南下的“外来/原住”模式来否定20世纪初的“汉族西来/苗族原住”学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多元的中国民族史阐述才经过多方讨论和修正而重新得到公认,形成了当今疆域内的“土生=世居”模式。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陈蕴茜《国民党中央党史陈列馆与辛亥革命史叙述》考察了国民党中央党史陈列馆的建立过程,进而剖析国民党中央党史陈列馆这一近代公共空间,将以“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及其起义”为重心的官修辛亥革命史叙述推向社会各界,以实现其宣传党化教育的目的。作者指出,展览是最为直观、浅显、感性的空间形式,是意识形态传输的有力工具,国民党中央领导人和党务要员根据自己的政治意图来选择、安排展览的叙述体系,在展览的呈现与遮蔽之间,折射出国民党关于辛亥革命史叙述的正统与非正统关系。中央党史陈列馆使辛亥革命史文本叙述空间化和情境化,参观者在展览空间中接受更具冲击力、更为真切、更富情感的革命史教育,从而强化了正统的辛亥革命史叙述,也强化了党化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王马克(Marc Matten)《现代中国的双重知识体系——科学、伪科学与实用主义》提出并试图回答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力普及科学、破除迷信,却能包容根本无法用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来解释的中医/中兽医?作者利用1950~1970年代的兽医手册、教学手册和直观教具等资料,展示了现代中国两种知识体系——西方现代医学模式与中医学/中兽医学——在普通民众当中是如何被创造、改变和传播,二者又是如何对抗与交融的。党和政府对社会实践和群众路线的强调,使得中医学和中兽医学能够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并使之免于被当成迷信的危险。与此同时,中国没有西方那种心神与身体、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二分法,因此中国的科学概念不是唯一的,但却包罗广泛,以至于有时能将理论和伪科学的东西结合到一起。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东育《朱舜水与“浙东中华主义”》通过考察明儒朱舜水(1600~1682)的学术渊源和“东夷褒美”言论,对将其视为“儒家文化的传播者和弘扬者”的学界定论提出了质疑。朱舜水在明亡后多次赴日“乞师”,并于1659年定居日本直至病逝。他的学说中虽不乏朱子学和阳明学的成分,究其实质却既非朱子学亦非阳明学,它所汲取的是两家学说中后来几乎被偏废了的“格物致知”精神和“事上磨炼”价值,而不是“理在气先”与“心外无物”的禅机玄理。其学术特质和家国遭遇,决定了他在日期间并力推出的不可能是以道学为代表的儒学主流,而是具有浓厚务实精神和地方特色的“浙东中华主义”。朱舜水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在日本大谈华夷,旨在强调“文野之别”。可当华夷观念被措置于清朝和日本之间时,“文野之别”就极易转化为“国族对峙”,这正是他去世二百余年后所发生的历史事实。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凤阳《环绕“公共性”中轴的“德”与“法”——关于古典共和治国纲领的一项类型学分析》更具政治哲学色彩。作者指出,发源于古希腊而成熟于古罗马的古典共和传统,表达了一种“天下为公”的价值诉求,这是共和的精髓。在古典时期,对政治生活之公共品质的执著捍卫,衍生出两个最基本的治国方案。一个方案的进路是:为确保“天下为公”,怎样通过教化和培养,引领公民对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做出优先选择?另一个方案的进路是:为免于“天下为私”,如何借助混合与均衡,防范公权蜕变成操控在个别人或个别集团手中的私器?前者为“德治”方案,崇尚“积极”的进取;后者乃“法治”方案,偏重“消极”的守卫。这两个方案的互补性复合,构成了古典共和传统完整而富有弹性的治国纲领。但是,随着现代性的成长,这个完整的治国纲领被撕裂了。现代意义的诸多共和类型,从某种角度看,似乎是在新的情境下伸展了古典共和治国纲领的某一片断或环节。

#### 四 翻译实践与跨文化交流

近代中国的许多重要概念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一批学者文人从西方和日本(尤其是后者)的社会科学著作中翻译、借用而来的,这是中国史研究者的共识。为抵制“和制汉语”的污染、维护本国语言的纯粹性,严复曾试图以古

语或自创新词作为西方概念的中文译名,却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几位参会学者着眼于近代中国的翻译实践与跨文化交流,从另一层面丰富了概念史的内涵。

日本成城大学经济学部陈力卫《“同文同种”的幻影:梁启超〈和文汉读法〉与和制汉语》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重新考察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进而探讨在“同文同种”的意识下,中国人是如何理解日语新词新概念的。论文通过考察尚未被研究者关注的1900年励志会版,厘清该书改版的经纬,指出其变异部分基本上集中在第三十八节的“和汉异义字”上;并通过分析复原初期版本的原始状态,阐明该版本演变的源流。随后重点考察了“和汉异义字”的增补方法,通过检讨其与日本近代国语辞典《言海》(1889)的关系,阐明后者在词汇增补和释义上的影响及由来。这本小册子的增补和流传过程表明,梁启超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日“同文同种”的意识下,努力凭借自己的汉文能力去理解日语,并希望尽快从日文中汲取大量的新知识新概念转介到汉语中来,结果却难免产生一些消化不良、一知半解的接受认识。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孙江《翻译宗教——1893年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中国与日本》以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大会为中心,探讨了“中国宗教”在世界宗教舞台上是如何被表述和理解、从“religion”到“宗教”的翻译过程又是如何完成的。出席此次大会的中国驻美外交官彭光誉指出中文的“教”不是religion,儒教也并非宗教,他采用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办法,将religion译为“尔厘利景”。在其意识深处,所谓世界religion大会不过是基督教大会而已,而他是一个向基督教大会表明儒教立场的“他者”。来自中国的六名西方传教士都认为中国存在宗教,中国人有宗教心,但基于基督教的立场,他们对中国的儒释道各教都给予了较低的评价,甚或特别强调儒教和道教背离了古代宗教精神。中国知识人虽曾抵制以“教”和“宗教”翻译religion,但在佛教和日本的影响下,“宗教”最终作为religion的正式译名,在20世纪初成为中国人的常用词。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晚清社会学的翻译:以严复与章炳麟的译作为例》详细考察了晚清译介社会学的两大主力——严复和章

太炎,据以分析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作者指出,清末“社会”观念确立之后,“社会学”一方面被人们认为是对所处生活情境的科学性描写与分析,另一方面也被视作改变社会的一种方法。在此过程中,学科内涵之认识与体系之形成伴随着翻译内容的选择,以及译者间的思想交锋。至1903、1904年间,中国学界逐渐发展出两种社会学模式,分别为严复采取的“调适取向”与章太炎采取的“转化取向”,来了解社会与构思未来。此二社会理论取径在民初继续发挥其影响力。前者由李剑农、章士钊、李大钊、杜亚泉等人承接,建立以演化论为基础的“政治调合论”、“新旧调和论”;后者则由刘师培为首的“国粹学派”与章氏弟子朱希祖等人来继承。刘师培融合了严复与章太炎的想法致力于从社会演化观点来重探并书写中国历史;朱希祖则强调史学与社会科学之结合,并尤重社会心理的面向。晚清民初所译介的社会学,成为展示政治思想、学术理论(尤其是历史观)的重要一环。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外国语学部工藤贵真《两个民国文坛与厨川白村》考察了日本作家厨川白村(1880~1923)及其作品在1920年代民国文坛和1970年代台湾文坛的译介与接受情况。厨川白村去世后,其著作在日本很快被人们忘却,在汉语语境中却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不仅被系统地译介,而且超时代地扎根于各个地区的特殊性质之中并始终保持着活力,作者将其称为“厨川白村现象”。厨川白村的代表作《苦闷的象征》、《狂犬》表达了一种迈向新时代所需的革新与反抗精神,呈现出动物性“生命力”的“彻底的全兽主义”特征,这种风格引起了日本读者的反感,却在中国文坛激起了强烈的共鸣,他们希望通过介绍和阅读厨川白村,从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和文学理论中发现改换旧文学、旧文化、旧社会的新模式。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与语言学系林少阳《西学、明治日本的文学史书写与史学写作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晚清中国的影响》着力探讨了日本明治时期(1867~1912)文学史写作与日本国族历史写作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对中国的现代史学草创及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影响。明治日本的“国文学”概念之出现,是汉字圈中的“日本文学”向日本国族框架中的“国文学”变化的结果,这一国族化的倾向也可以视为日本与世界文学在东亚语境中相遇的结果,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与世

界哲学(如丹纳和黑格尔)相遇的结果。日本的国文学和国族史写作又影响了晚清中国的文学与史学,如梁启超的“新小说”和“中国文学”观念的成立,即深受日本“国文学”的启发。清末文学史叙述与明治日本文学史叙述都具有一定的“国策”性质,只是中国的文学史偏重于现代化问题,而日本的则偏重于民族主义的国家认同建构。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韩伟华《“被误读的让—雅克”:试论卢梭在近现代中国之译介及其影响》指出,从20世纪初梁启超、杨廷栋等人以日本为中介翻译、传播卢梭的民主思想,至20世纪末朱学勤、王元化等学者对卢梭在当代中国之误用所作的反思,中国知识界对于卢梭的认知经历了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漫长历程。但无论是将卢梭视为民主革命的先驱而大力褒扬的一方,还是将其当作极左激进思潮的始作俑者而批判的另一方,论者对卢梭的法文原著均知之寥寥。卢梭著作已有许多中译本,但这些译本所依据的底本往往存在不少缺陷,而且对法文本中十分重要的导论和注释大多弃之不译。因此,有必要对重要的卢梭文献进行重译,同时也须系统地译介一批晚近欧美学界诠释卢梭的研究性论著,作为导读性的辅助材料。如此,卢梭的真面目或有望最终展现在国人面前。

## 五 东亚概念史研究:可能与可为

此次会议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是专门设立“圆桌会议”环节,让与会者就“近代东亚历史的基本概念研究计划”展开深入交流。学者们热烈而有序的讨论,将会议引向高潮。讨论涉及的主要内容,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东亚概念史的学术意义。概念史研究起源于德国,德国学者施耐德却在会上声称“德国概念史的传统已经没落了”,他的意思是,概念史试图考察概念的演变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关系,然而它并未实现这一目标。一言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与会者关于概念史是否必要、东亚概念史是否可能的激烈争论。方维规坚决反对概念史“没落”或“失败”的看法,尽管德国概念史的三部巨著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但概念史研究仍在继续,许多学者还在哲学、文学、音乐、绘画、建筑等领域进一步努力,概念史杂志仍在刊行,因此绝不能说它结束或失败了。铃木贞美认为概念史是不断地生产出来的,它不是目的而

是手段,应该把它和社会制度、社会变迁联系起来,否则概念史研究会走进死胡同。林少阳认为概念史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具有跨国、跨语言、跨历史语境、跨学科的特点,做概念史就是要把跨越的整个过程重新展示出来。概念史研究是一个拥抱开放的行为,具有激活思考、引向未来的重要价值,但是不必把它与德国学派、英国学派等派别纷争搅和在一起。黄克武赞同“史无定法”之说,认为不必拘泥于方法论争,只要能做出好的研究即可。概念史研究将分析的单元从人物、文本、思潮等变为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探讨一些新的问题,可以增加我们分析的深度。黄兴涛、章清认为,概念史研究无疑十分重要,概念史方法也能让我们看到以往看不到的东西;但概念史不是全部,它其实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同时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经过讨论,大家进一步明了了概念史的重要价值,同时也意识到了概念史的边界与限度。

其二,东亚概念史的研究路径。施耐德指出,中国近代的重要术语大概有90%是外来词,做概念史首先要了解这些借来的词在原来文化中的意思是什么;其次要了解它传到中国来的过程,最后还要回到全球性的视野,考察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意涵与全球历史、政治、经济趋势有什么关联。张凤阳主张将概念史理解为跨学科的研究,其主体可能是历史学的、语言学的,但应该再融合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的一些方法。具体说来,开展中国的概念史研究须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如何研判中国概念史变迁的“鞍形期”或“转型期”;二是如何评估一个概念是否达到科塞雷克所说的“四化”标准。他认为可以从概念起源的时间、概念使用的频率、概念流播的范围、概念使用的强度等方面来衡量;三是如何选择代表性的、典型性的文本;四是如何对概念作词源性考察和判定它在政治哲学中的位置;五是如何揭示概念变迁与社会结构变迁互动的机制。韩东育强调东亚概念与西方概念的不同特征,东亚的概念没有非常严格的边框四至,这样西方的概念到了中国后就可能非驴非马,做概念史研究必须注意这一点。黄兴涛认为,中国、日本、韩国的概念史学者应该站在反思西方中心的角度上,更多地关注本国特色;同时也不一定要等到完成了现代性再去考虑后现代的东西,可以采取多头并

进、共同思考的路径。

其三,东亚概念史的发展前景。梁一模对韩国的概念史研究作了回顾和展望,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概念史”、“没有翻译的翻译”、“作为疏通的概念史”等命题,并期待东亚学者共同努力,编出一本东亚概念辞典。承接这一话题,“圆桌会议”的引言人孙江回顾了2004年、2006年尝试编纂东亚基本概念辞典的两次“未遂事件”,并介绍了他和学界同仁正在推进的研究计划:一是在2012年上半年创办《亚洲概念史研究丛刊》,计划一年两卷;二是以概念史研究丛书的形式,将已有的概念史研究论著译成中文;三是系统考察近代中国基本概念的形成和本土化问题,在此基础上编纂中国的概念大释典。韩东育认为,编纂中国和东亚的概念史辞典首先需要认真地考虑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必须尽最大可能地减少例外,要能把史学的、伦理学的等等概念都包括进去,这样才更有意义。施耐德强调,以其任务之艰巨、过程之复杂,中国的概念史研究需要一个很大的研究团队,需要多文化的、多元的研究背景。黄克武提出,成功的概念史研究要实现三个方面的整合:一是团队的整合,让各自为战、分崩离析的概念史研究者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二是学科的整合,尤其需要语言学家的加入,再加上思想史的分析;三是代际的整合,概念史研究非一代人所能完成,需要培养年轻的学者。

经过一批学者的译介和实践,概念史在中国和东亚已经崭露头角,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和关注者。这次国际学术会议的成功举行和它所达到的学术水准,正是一种明证。然《尚书》有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与会学者既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和东亚概念史研究的宏伟蓝图,也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想取得或接近西方同行们的巨大成就,中国和东亚的概念史研究者无疑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收稿日期 2012—03—20

作者李里峰,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陈蕴茜,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江苏,南京,210093。

【责任编辑 映雪】